

晚清时期外国人对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认知

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 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7)

【摘要】晚清时期外国人对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产生原因提出了种种看法。他们认为,中国茶叶在种植、加工制作、销售方法、成本税厘诸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因而无法与印度、锡兰茶进行有效竞争。他们从茶叶种植、加工制造、贸易条件诸方面,提出了破解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对策建议。这些对策建议触及到近代中国茶业危机产生的一些要害因素,涉及茶业振兴的一些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及启发价值,推动了近代中国茶业振兴活动的兴起。由于侵略本性的局限,晚清时期的外国人不肯也不愿真正从本质上揭示中国茶业危机的产生原因,更加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解决中国茶业危机的有效对策建议,反而公开宣扬侵略有理的谬论。挽救中国茶业危机,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赢得完全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奠定茶业发展的坚实政治基础。

【关键词】晚清外国人;中国茶业危机;产生原因;对策建议;评价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4-0003-11

The Foreigners in Late Qing Dynasty Evaluate about the Tea Crisis of Chinese Modern Cognition

TAO De-chen

(College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 Nanjing 210007)

Abstract: Foreigners late Qing Dynasty of China's tea industry crisis causes Modern raised various views. They believe that China in the tea cultivation, manufacture, sales methods, is difficult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ost of the tax aspects of PCT, and therefore can not effectively compete with India, Ceylon tea. Them from tea cultivation, processing, trade aspects, proposed to break Chinese tea industry crisis modern suggestions. These suggestions touch on some of the key factors of modern Chinese tea industry crisis generated some practical cases involv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with a certain objectivity and enlightenment values, promote the rise of Chinese tea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Modern. Because of the aggressive nature of the limitations,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reigners are willing to dare to reveal the real cause of Chinese tea industry crisis in essence, impossible to propose solutions mor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Chinese tea industry crisis fundamentally, but the public airing of aggression rational fallacy. Save the Chinese tea industry crisis, there must be a basic premise, which is to overthrow the rule of the three big mountains, to win complet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and lay a solid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 industry.

【收稿日期】2016-03-01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华茶外销与茶文化传播研究”(15YJA770025);解放军理工大学201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茶向世界传播研究”

【作者简介】陶德臣(1965—),男,经济史学硕士,解放军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

A Key words:the foreigners in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tea industry crisis; causes; countermeasures; Evaluation

中国是茶的祖国,茶叶出口历史悠久,地位重要。18世纪20年代后茶叶构成中西贸易核心商品,占据中国出口各货价值首位的时间长达200余年,是中国出口创汇最重要的产品。“夫茶叶一宗,上供税课,下系民生,为东南数省民命攸关。”^①由于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新兴产茶地区挤入世界茶叶市场,19世纪80年代后期,“洋茶因而完全夺去了中国自古以来对茶叶的垄断”^②。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国官方及民间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强烈要求采取切实措施,挽救茶业危机,学者对这方面已有较多揭示^③。面对近代中国茶业危机,当时的外国人又是怎么看的?这方面的情况学术界无任何专门研究。鸦片战争后,外国外交官、冒险家纷纷闯入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教、经商、办学甚至做官。这些人包括未到过中国却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通过对中国茶业发展的独特观察,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研究这些看法及相关材料,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研究,从中得到一些有益启示。

一、晚清时期外国人论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产生原因

1890年的“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英国外交部《驻华领事商务报告》,即 Commercial Reports)比较了印度和锡兰种茶人比中国种茶人具有的11个有利条件,即:可资利用的资本较大;有低利借款的便利条件;没有厘金、入市税和出口税;有更好和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化学和农业知识;对购买者的嗜好和要求了解更彻底;有便利的运输工具;大大接近购买的国家;有无数公共工程,旱季便于灌溉,雨季避免淹没;茶园面积庞大;有优良的机器。相对于印度、锡兰种茶人的这些有利条件,中国种茶人只有一项有利条件,“那就是中国的种茶人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工资工作,因而对于工作更加细心和辛勤”^④。依据这一经典论述,结合其他较为分散的见解,可知晚清时期的外国人认为,导致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原因主要来自四大方面:

(一)茶叶种植方面的弊端

晚清时期的外国人清楚,中国茶的竞争对手“印度和锡兰的茶园与中国茶园比较起来,面积非常庞大”,而且“印度和锡兰的茶园,一般都是公司所有的”^⑤。这样带来的好处是:采茶人等经常从事同一种工作,可以熟练敏捷;这是偶然做一次的人所无法办到的;一种牌号的茶叶,在很短期间全部采完,质量更能统一;烘焙厂房设在种植园内,茶叶采下便可立即入栈,避免从茶园运到仓栈途中遭受风吹日晒枯萎;可以节省从茶园到烘焙厂房之间的装运手续;各步操作手续,可以连续不断进行,避免人力或燃料的浪费。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庞大的茶园面积,足以生产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大量茶叶。1887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444页。

② 《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6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337-338页。

③ 史念书:《清末民初我国各地茶业振兴纪实》,《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王力:《清末茶叶对外贸易衰退后的挽救措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朱从兵:《设想与努力:1890年代挽救华茶之制度建构》,《中国农史》2009年第1期;苑朋欣:《商部——农工商部与清末茶业的振兴》,《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陶德臣:《张之洞对近代中国茶业的历史贡献》,《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陶德臣:《洋务派与近代中国茶业》,《中国茶叶》2010年第7期;陶德臣:《张謇与近代中国茶业》,《农业考古》2012年第2期。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15-1217页。

⑤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15-1217页。

年,英国外交部《驻华领事商务报告》记载,“据汉口的腊姆齐先生说,印度茶园每英亩每年可产茶 600 磅”^①。到 1895 年止,英国人在印度的茶业投资达到 3500 万英镑,茶园面积 637000 英亩,雇工 89 万人,产茶 23350 万磅^②。19 世纪 80 年代中,锡兰也有茶园 135 个,面积 20 余万英亩,平均每个茶园 1500 英亩,产茶 60 万磅^③。“控制着伦敦市场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的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④。即使是 19 世纪 90 年代前的日本,茶园面积也较大,“其豪农富商自种茶园,有辟地五十余町之广,制茶二万余斤之多者,比之从前,大有进境云”^⑤。

中国茶叶生产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外国人认为,洋茶对中国茶的比较优势,实质上“就是制造商对手工业者的优势”^⑥。他们说,在中国,“大半以种茶为副业的小业主和小农户”^⑦,根本谈不上有成片象样的茶园,每户生产者产量极为有限,普遍只能“生产 50 磅或 500 磅的叶子”^⑧。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江海关总务司好博逊再次说明小农经济造成茶树种植、管理的严重问题:“据本商所闻,种茶之人皆不似印度、锡兰两处,拣择深好之地土,视为不甚要紧之事,常用者即浅土地方,树根下因不得水养,所以到天亢之时,叶内汁少而味即不能好;况并不用肥地物料,不去地下野草,亦不删除旁枝,又不换去老树,又不移种新地,但用一种肥地之物料,即将地下之草烧化成灰,分洒在地。所谓删除繁枝者,但俟树大时截去长处,使不过高而已”^⑨。

近代中国茶叶种植、采摘、管理方面存在的弊端具有普遍性。这种弊病造成中国茶叶产量少、质量低、效益差,使中国茶业在与洋茶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缺乏改进生产方法所需要的智慧和资本”^⑩。这种不足长此以往,最终导致中国茶业的衰败。相对于洋茶的蓬勃生机,“而在中国则依旧是同样的老茶树,以旧有的培植、采摘及焙烤的方式,年复一年地继续着无望的挣扎”^⑪。

(二)茶叶加工制作方面的弊端

晚清时期的外国人也比较了印度、锡兰等洋茶与中国茶在加工制作方面的巨大区别。他们说:“印度有优良的机器,对于种茶人有三重好处:降低制茶成本;茶叶质量提高;保证交货时与货样质量一致”^⑫。英国人所撰《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认为,印度茶兴旺发达的根本原因是“擅长处在烘制之善也,印茶烘制之法,与华茶大相径庭,印茶自烘制以至装箱,无一不用机器,而人工极为有限,是以色香味皆胜华产。不特此也,因机器力匀,而烘制之茶通盘一律,无参差优劣之病”。“机器既省人工,又省火料”^⑬。

与印度、锡兰、日本等地资本主义现代化茶业相比较,中国“对于茶叶的焙制,也同种植一样地缺乏制度和办法。每一道操作,都是用手工进行的。中国人不把茶叶揉捻成球而放在日光下晒至半干,然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第 1212 页。

② Economist, Herald, 1897 年 5 月 28 日, P 948 转载 North China Herald。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第 1189-1190 页、第 92 页计算。

④ North China Herald, 1887 年 10 月 27 日, P 446。

⑤ [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 38,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3 年,第 925 页。

⑥ North China Herald, 1887 年 10 月 27 日, P 446。

⑦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第 1208 页。

⑧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第 1201 页。

⑨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第 1201 页。

⑩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年, 广州, P553。

⑪ Trade Reports, 1884 年, 福州, P283。

⑫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第 1217 页。

⑬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 10,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2 年,第 779-780 页。

后放入袋内用脚踩踏,直到绿色的粘液流出,这种粘液无疑含有许多茶叶里最好的成份”^①。茶商也是各谋其业,“且股本无多,不能购办机器”^②,”他们用经验代替科学”^③。手工制茶的问题很严重。一方面,外国人认为中国茶不卫生,说中国茶“悉以人之手足为之,未免不洁”;另一方面,造成中国茶标准不统一,“因中国各牌之茶叶,粗细不一,美恶相杂,往往底面不符,鱼目混珠,随在而有”^④。

中国手工制茶竞争不过国外现代化茶业,其后果可想而知。1875—1876 年度的《Commerail Reports》说:中国茶叶“近年来质量降低的原因,毋宁说一方面是由于加工草率,希望提早将茶叶送到市场上去;另一方面是由于将生叶制成成品的必要过程上分歧而不统一。”同时,“装箱人完全是一些投机者,多半都不是当地人,他们临时租一处房子向种茶人另星收集茶叶,因此来自不同地区的叶子被混在一起,纯粹一种香味的茶叶很少。”因此,外国人认为,生产良好品质茶叶“这些迫切需要的措施,在中国完全没有,产品处于原始的、不科学的状态”^⑤。

(三)茶叶销售方法方面的弊端

印度、锡兰、日本茶从生产到销售,环节很少,运销便利。生产者了解市场,有适应市场需求的办法,因而茶叶销售顺利。“又云其种茶者,系一富户,一茶园内有千株万株之茶树,其自种植至摘取泡造并装潢及运送他邦销卖,始终皆一事主,皆一事权,所以事事皆如其意以为之,无分扰其权力之人,因之其物则上等之物,所获之利遂亦归于一人,并因之其物之价极廉”^⑥。日本茶叶烘焙行由外国人经营,“他们在横滨、长崎和神户有自己的烘焙行;由于这些地方几乎位于茶区的中心,所以他们与种茶人之间的商贩很少。因此,装箱和烘焙都做得很道地,茶叶的质量很好”^⑦。印度、锡兰茶生产制造过程中,非常注重市场需求,了解市场变化。英国人认为,英国殖民地茶“胜于华茶”的三大原因之一是“因英属各茶,其初虽与华茶价值不同,然茶味较浓,可以减用”。因此,英人“多购印茶以代华茶,故进口税不增”^⑧。这是茶叶中丹宁含量高的结果。但在俄国,丹宁高含量高的茶却不受欢迎,所以“印度茶锡兰的种茶人,就具有必要的化学和农业化学的知识,能在种植和制造茶叶的时候,使茶叶的丹宁含量达到一定程度”^⑨。“印度茶所以能够达到目前这种地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印度茶的种植与制造有欧洲技师的监督。这些技师能够制造出各种等级的茶叶,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另一个极重要的优点,在于每年的茶叶收获量,事前有精确的估计,以指导购茶者准备购买”,而且“印度和锡兰的种茶人有一个优于中国人的有利条件,就是他们与零售商人稔熟;也熟悉他们的经营方法”^⑩。茶叶制造出来后,有便利的交通工具进行运输。“印度和锡兰有许多茶园建有铁路从打包场直通码头,轮船就停泊在铁路旁边。因此茶箱可以廉价运至目的地,而且包装也可不因多次搬运和粗心的搬运伙的碰撞而破损”。从锡兰到英国、俄国的距离,只抵中国与该国距离的一半,印度与此两地的距离仅有中国的60%,”因此,既省运费又可迅速售出,也就加快了投资的周转费”^⑪。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12-1213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9页。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17页。

④ 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930页。

⑤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6-1207页。

⑥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84页。

⑦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6页。

⑧ 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931页。

⑨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6页。

⑩ Trade Reports, 1880年,汉口, P45-46。

⑪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16-1217页。

中国茶叶在这些方面弊病丛生。由于种茶的副业性质、小农方式,决定了茶叶“及摘者卖于制者,制者复卖于转送者,转送者复卖于洋商,故其费多而其价自亦较昂”^①。茶叶流通环节多,费用大。也就是说由于茶叶生产“是由个体小农进行的,他们把采集的茶叶,就近在乡间市集上卖与收购商贩,收购商贩或将茶运送到通商口岸去出卖,或在当地卖与茶商,洋商又从茶商之手购买”^②。茶叶交易过程中的盲目性无法克服。茶叶从产区运到通商口岸的过程中,同样困难重重,“产茶之处,山路崎岖,艰于挑运,厘税脚费,皆比日本为重,难以振作”^③。“中国政府对茶区和码头交通的改进,则毫无任何措施”^④。如此恶劣的交通条件,造成茶叶运输时间长、茶箱破损多、茶叶损失大等突出问题,无形中增加了茶叶成本,降低了茶叶竞争力,阻碍了茶叶的外销。

(四)茶叶成本税厘方面的重负

印度、锡兰、日本茶除由于机器制茶、大茶园生产、销售便利带来成本减轻外,还由于政府重视带来成本的进一步下降,更加突显了它们的优势。佚名英国人所写《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阐述了政府态度对茶叶经济兴衰的重要影响。他在强调种植采摘、机器烘制诸法后,称:“而尚有一极要之事,尤须致意,盖亦茶业之衰之一端也。印度、锡兰国家(应是英国殖民地,当时还未独立——引者),皆竭力鼓励茶民,民间之租官地种茶者,轻其租价,而于若干时内不征赋税,复为辟野筑路,举凡利于转输之事,无不一一兴办,所费公款为数甚巨。又于种茶所在之处,分设巡捕以驻其地,特立公堂以听其讼,薄其就地征赋,而豁免其出口之税”^⑤。日本政府鼓励用聪明的方法种植茶树,“没有厘金,出口税大约只等于中国的一半”^⑥。实际上,所谓征税也“只征课一笔名义上的税款”^⑦。

中国对茶业的态度与国外政府完全相反。“若夫中国国家则不然,一切皆漠然视之,转输之不便不问也,生意之为难不顾也。种茶之地,无尺寸之土不征种茶专税,种茶者苦之,于是茶树之应疏散者,密布之,以避其赋,复于树间之隙地播种菜蔬,以分土肥,土肥分而出茶少矣。乃至茶自内地而至口岸,又有种种厘捐船钞,所捐之数,不能预定,一任厘卡委员之出入上下。最末则为出口税,每担须纳海关银二两五钱,于茶之成本又加百分之十五矣”^⑧。

晚清时期的外国人对中国茶叶成本税负之重有目共睹。1887年,汉口江汉关税务司布雷顿提供的材料,说明“中国茶叶所付的税款,包括厘金在内,据估计为4.1两至5.40两”,约为茶叶价值的35.5%，“或每磅2至3便士”^⑨。还有材料说“而中国人所负担的子口税和出口税独重,全部税款在生叶价值的50%以上”^⑩。由此可知税厘之重严重削弱中国茶的国际竞争力。这就是社会舆论所讲的“况厘税太重,价值太昂,未能与锡兰等处争衡”^⑪的实情。正因为如此,英国驻厦门领事傅冷英卡士曾尖锐地指出:“此辈但知教茶农考求种茶制茶之法,而不思茶税之重为第一弊也”。他认为,中国茶“若不大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84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51页。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9页。

④ North China Herald, 1897年10月8日, P 666。

⑤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1页。

⑥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0页。

⑦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8页。

⑧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第783页。

⑨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13-1214页。

⑩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8页。

⑪ 《光绪二十九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74页。

减其价,则难脱手矣。但茶价贱则厘税又不稍减,茶农之不伤本者鲜矣”^①。税负之重的结果是茶农“对茶叶种植本来可能有的那种恢复能力,也因重税和其他负担而被减弱了”^②。

晚清时期的外国人认为,正因为中国在茶叶种植、加工制造、销售方法、成本税负这四大方面与印度、锡兰、日本茶业存在巨大落差,最终导致了洋茶兴盛、华茶衰落的悲剧发生。

二、晚清时期外国人关于挽救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对策建议

针对近代中国茶业的危机及产生原因,晚清外国人从不同动机和目的出发,提出了种种挽救之策。这些对策建议内容丰富,各有侧重,归纳起来,不外乎从茶叶种植、加工制造、贸易条件诸方面入手,来寻求破解近代中国茶业的困境,这就是茶叶种植、管理、采摘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和办法。1887年,《Commercial Reports》说到中国茶业,“如果他们希望每英亩的收获量与印度和锡兰一样多,制度和办法是最重要的”^③。

(一)改良茶叶种植采摘之法

佚名的英国人认为,“现欲挽救中国茶业之衰,约而举之,厥有两端,一曰种植采摘诸法,一曰烘制诸法”。采摘茶叶,应注意方法,“亦不尽叶而采,只摘嫩叶而留其老者”,“倘采摘如法,则中国居中产茶数省之茶树,可生叶至五月之久,自四月以至八月依次发烘,无堆积霉烂之病”^④。

改良茶叶种植、采摘的动力从何而来?“在这种紧要关头,一般认为只有政府才能予以挽救。没有政府的干预、帮助或批准,任何改革也行不通”^⑤。但是晚清政府对此麻木不仁,没有采取多少实际行动,这让外国人想入非非。他们认为,改良的希望应该寄托在外国人身上。他们甚至毫不掩饰地鼓吹:“可以肯定地说,只有在产茶区输入欧洲的资本和经营方法,才能挽救这一国家的茶叶外销免于衰退。如果外国人能够自由进入这一国家,情况一定会彻底改变:不仅茶叶的装箱可有一定的制度,不致使茶叶在枝头长老,也不致因茶主在价钱上争执毫厘之差,使茶叶在采摘之后萎凋;而且还可将荒凉的山腰开辟出来种植茶树,以及使成千名半受饥饿的农民就业”。他们进一步设想,“如果许可外国人在内地购买或租佃土地,几个井然有序的种植园,便会作为榜样,及时改造中国人的制茶方法”^⑥。这就是外国人祭出的改良中国近代茶叶种植的法宝。

(二)改良茶叶加工制造之法

外国人普遍认为,洋茶尤其是印度茶、锡兰茶击败中国茶的首要武器是实行了茶叶加工制造的机械化。他们认为,挽救中国茶业之衰,“约而举之,厥有两端,一曰种植采摘诸法,一曰烘制诸法”。烘制诸法就是要如印度一样,“无一不用机器”^⑦。作者十分关注中国茶界使用机器的情况,指出:“前者不准运机进口制造土货,幸此例现已除去,有补于商务者甚大”^⑧。他列举了温州、福州使用机器制茶,效果明显的例子。为此,上海的英商肯倍尔专门致信福州茶商,大加赞扬采用机器所制茶:“此次寄来茶样,力足经泡,远胜向来市上所售。诸君试办之初,已有成效若此,良可欣慰。倘能潜心考究,精益求精,将

① [英]佚名:《论中国茶务》,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第778页。

② 《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册,第330页。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12页。

④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第782页。

⑤ 《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6册,第338页。

⑥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7页。

⑦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第779页。

⑧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第783页。

来定可与印度、锡兰所产并驾齐驱也”^①。佚名的日本人在《论中国可兴做茶新法》认为,福州茶商机器制茶“即就新到之样茶而论,其效已见,若推广行之,将来能获厚利,固意中事也”,并认为“意者中国茶叶之更张,将自此始,亦即中国茶运之转机有时欤。中国之茶,但能于制法稍为变更,尤易合英人口味,若以中国茶仿照印度制法,其兴旺畅销之新象,诚可操证券而待也”^②。但专门到福州考察过当地机器制茶情况的英国大茶园主非尔哈士特对此却并不抱乐观态度,他注意到福州机器焙茶公司,“虽中国人为之,而实欧人赞助之,勤勉富人推拓新法,设立公司,其中合股者闻欧人六,华人六,每人股本一千圆,余息照例均分”,他的结论是“虽然无欧人以引导之,恐亦不足以成事,何也?中国之人,知守而不知变,知因而不知创”^③。有外国观察家思考中国茶叶“这个行业从外国引进机器能否取得效果?”他认为“看来希望甚微”,他在进行了一番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一个即使对中国及其作风只有肤浅认识的人,也不会相信生产者能够很容易地或很快地获得这些条件”^④。英国驻厦门领事傅冷英卡士也尖锐指出:“识时务者之意曰,中国茶务之弊,非天下最巧之机器所能救,除是将厘税全免又兼用机器或始有济耳”^⑤。近代中国机器制茶的尝试,真正情况是“但均系一隅试办,无裨全局,且无茶师口传指授,办理安有把握”^⑥,说明仅靠机器制茶这一招,根本不可能取得茶叶国际竞争的决定性胜利。

面对 19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零星进口茶机制茶的商机,敏感的外国洋行不但在中国国内报纸上大登茶机广告,而且还将茶机运到中国销售,并鼓吹茶机订购的各种使用方法。台非特厂生产的 5 种茶机形成配套^⑦。汉口百昌洋行见湖北使用烘机有效,“亦置第一号昔洛哥一具,深为惬意”^⑧。英国人认为,“发茶之香,以烘为尤要。苟烘不如法,即有未透过之病,未透则湿蕴于内,过烘则油发于外,虽上品细味,亦必变为至劣之茶”^⑨。因此,“最要者为烘叶机器,茶之香味全系于此”^⑩。这种机器最大者“恩特来斯卫勃昔洛哥”,每天可烘茶 24 担—25 担,在上海交货付钱,需 520 英镑,不包括此机与滚机同需汽机 1 具约 4 匹马力的费用。旧式烘机“阿泼得拉夫昔洛哥”,每日螺纹钢可出茶 8 担,在上海的交货价为 170 英镑(零件除外),“然需购五百二十磅之大机,价虽较巨,而犹上算”^⑪。其余机器如检茶机在上海的交货价约需 70 英镑,装箱打包机约需 50 英镑(均不包括零件)。

其他如上海忠义洋行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日《申报》刊登广告,出售英国创制茶机 4 种,含焙茶机、揉茶机、拣茶机、装箱机。并说使用这些机器较人力既快且便,这些机器已经在印度、锡兰使用,“因而印度之茶务骤行盛旺”。《申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登有谦泰洋行售茶机广告。七月初二日、十月十五日,又有谦太洋行售茶机广告。当然,《申报》上刊登出售茶机的广告还有很多,这说明茶叶加工制造采用机器是外国人看好的一大趋势,他们相信茶机在中国的销售前景广阔,因而大做广告,以求招徕。

①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 10,第 779 页。

② [日]佚名:《论中国可兴做茶新法》,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 7《农政》,第 553 页。

③ 《英人查探闽茶问答》,《农学报》第 19 期,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下。

④ 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第 6 页。

⑤ [英]佚名:《论中国茶务》,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 10,第 778 页。

⑥ 《萧主政补救丝茶折》,《农学报》第 48 期,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下。

⑦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 10,第 780 页。

⑧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 10,第 780-781 页。

⑨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 10,第 780 页。

⑩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 10,第 782 页。

⑪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 10,第 782 页。

(三)改善茶叶贸易条件之法

外国人普遍认为,中国茶叶贸易条件恶劣,无法与印度、锡兰、日本等地竞争。“至于长江改运章程,则于国课无益,而商民受累不浅”。所谓“长江改运章程”,即“在长江各口岸装茶出口,须先纳半税。倘到上海后,原箱装往外洋,则由关发给存票,以先纳之半税存关,抵日后应完之税。倘欲在上海拆运改装,则又另有烦苛章程,而成本益重矣。且海关存票,往往积聚甚多,虽系现有资本,而不能用诸他处”^①。这种“于国课无益”,却使商民受累不浅的“长江改运章程”是中国茶叶贸易不良的体现。“赋税重”是中国茶叶贸易条件差的突出表现,所以厦门英国领事傅冷英卡士说:“识时务者之意曰,中国茶务之弊,非天下最巧之机器所能救,除是将厘税全免又兼用机器或始有济耳”^②。

1887年10月27日,《北华捷报》比较印度茶与中国茶在生产、制造方面的巨大差别后,提出了挽救中国茶叶贸易的“良策”。该报说:“对于目前华茶贸易最有效的补救办法,应当是让外商自由地深入内地,并且采用最新的方法,制造供应市场的茶叶”^③。这就是外国人心目中“最有效的补救办法”。显然,外国人对这个“补救办法”充满信心,认为“在砖茶方面,有从西伯利亚来的俄国人在某些产红茶地区施行监督,他们表现出很容易适应中国人的方式,他们的政府也对他们保护备至”。但这种装箱制度,其实并未真正解决任何问题,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内地,外国人曾努力通过个人监督来建立健全的装箱制度。这番努力,的确是孤立无援的,除砖茶方面以外,一般都没有获得成功”^④。

三、晚清时期外国人认识中国茶业危机的评析

晚清时期外国人对中国茶业危机的认识内容比较丰富,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产生原因及对策建议两方面。如何看待这些认识?当然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辩证态度,又要从根本上及本质上认识问题。

(一)晚清时期外国人对中国茶业危机的认知揭示了许多客观事实

还在中国近代茶业畸形发展,直至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些外国人已经看出茶业“繁荣”下掩盖的衰落征兆及现象,他们发出的茶业危机警告,尽管十分刺耳,但却“忠言逆耳”,具有一定积极意义。1875年,英国外交部《驻华领事商务报告》谈到“15年前茶叶生产还是由中国垄断的情况”,由于印度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加尔各答的茶叶输出量由1861年的130万磅增加到1875年的2500万磅,“这些数字就不仅表示印度茶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劲敌,而且几乎使人担心:如果在种植和包装的方法上不求上进,中国将完全被逐出国际市场,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⑤。第二年,英国外交部《驻华领事商务报告》说:“无疑在印度的喜马拉雅山区种植园所在地,具有对种茶有利的土壤和气候等等条件。而且印度能够生产足够的数量,不仅可满足英国的需求,而且可满足全世界的需求”^⑥。印度茶开始主销英国,而英国又是世界进口茶叶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茶的最大出口市场,从英国市场即可明了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1875年度英国外交部《驻华领事商务报告》认为,中国茶衰落的征兆已经出现。“到去年为止,英国茶叶销量的增加是由中国和印度分担的,而从去年起,中国茶叶的销量开始停滞不进,全部增加的数字为印度所独有。这个事实是中国茶叶衰落的征兆”^⑦。“这是华茶在英国的前途更趋黯淡

① [英]佚名:《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第783页。

② [英]佚名:《论中国茶务》,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第778-779页。

③ North China Herald, 1887年10月27日, P 446。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7页。

⑤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186页。

⑥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187页。

⑦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190页。

的一个征兆”,中国茶叶贸易“其前途可能愈趋衰落”^①。到1887年,虽然中国茶叶出口量高达2327892担,仅低于1886年的2386975担、1888年的2413456担^②,但“从广泛的、一般的观点看来,中国茶之日就衰落,是无可怀疑的,而这并不是一个不关重要的问题”^③。外国人将这一年定为“早已迫近的华茶贸易危机毕竟到来了”,认为该年危机的标志是“茶叶品质不高,价格很低,销路不畅”,“中国商人损失极重,并且还要继续遭到损失”^④。事实证明,茶叶出口数量庞大的背后,掩盖的却是中国茶业全面危机的到来。可见,晚清外国人揭示的中国茶业危机是一种客观存在,决非是“唱衰中国”心理行为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晚清外国人分析了中国茶业危机的产生原因。应该说,有关中国茶业在茶叶种植加工制造、销售方法的弊病及成本税负方面的重负相关分析,导出了中国茶业与新兴产茶竞争对手印度、锡兰、日本的巨大差距。正因为具有全方位差距的存在,才最终使中国茶业竞争不过国外茶业,因而导致了中国茶业危机的到来及全面爆发。基于他们中国茶业危机产生四大原因的分析,晚清外国人提出应从改良茶叶种植采摘和加工制造方法、改善茶叶贸易条件诸方面,实施挽救中国茶业危机的努力。这些建议和主张,基本上也触及到了解决茶业危机的一些要害环节,涉及到当时茶业振兴的一些实际情况,因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当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不能简单加以否定。

(二)晚清外国人对中国茶业危机的认知刺激了茶业振兴活动

由于晚清外国人的特殊地位观察视角,他们能够较早也较全面观察到中国茶业的发展变迁及其未来走向,其相关看法比较容易反映到中国国内,从而影响中国的商人、文人、官员甚至封疆大吏。无论是《申报》、《农学报》、《商务官报》、《东方杂志》这样的中国报刊,还是外国人办的《北华捷报》等报刊都有相当内容涉及到外国人对中国茶业的看法、评论。而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洋行人员尤其是外交官的商务报告,均有不少内容谈及中国茶业问题。清朝海关的《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通商各关十年贸易报告》、《访察茶叶情形文件》实际上也是受雇于清朝的外国人即洋员所编写,这里面大量相关茶业的报道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外国人的看法。所有这些外国人的看法,使晚清社会不同阶层人士不得不认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这就是中国茶业危机其实从19世纪60年代已经潜伏下来,70年代在如福建等局面地区开始产生,80年代中后期迅速向全国外销茶区蔓延,90年代终于全面爆发。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焦虑万分,纷纷寻求破解之策。于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舆论为之一变,由以前对中国茶业的自负、自满逐渐转变为焦虑、担心、思考,各种相关材料不断呈现,茶务振兴活动日益兴起。晚清外国人对中国近代茶业危机的认识对茶业振兴活动的兴起起到了清醒、推动作用,中国人的茶业振兴活动,相当程度上正是通过阅读外国人的言论,了解到印度、锡兰、日本洋茶兴起发展的情况及其长处,了解到中国茶业的巨大差距后,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振兴之策。虽然中国不同人士关于茶业振兴的主张不尽相同,但也难以摆脱从茶叶种制、税厘、贸易、交通等方面入手。不难看出,这些主张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外国人认知中国茶业的主张,尤其是采用机器制茶,几乎被中国茶业改良者奉为圣经,以为只要采用了机器制茶,就一定能有利见影的效果,挽救中国茶业指日可待。

(三)晚清外国人对中国茶业危机的认知根本无法解决茶业危机

尽管外国人对中国近代茶业危机的认识深刻,揭示了许多客观实际,也发人深省,但从根本上说,身居中国的外国使领馆人员、受雇于清朝海关的洋员、数量众多的外国传教士、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洋行人员,均是外国侵华势力的代表及相关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他们不敢也不愿意真正从本质上揭示中

① Trade Reports, 1876年, P36。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4-1205页。

③ Trade Reports, 1887年, 九江, P116。

④ 《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3册,第119页。

国茶业危机的产生原因,更加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解决中国茶业危机的有效对策建议。所有这些对中国近代茶业危机的认知,都建立在对茶业自身固有弊病的分析上,提出的解决之策也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公开宣扬侵略有理,为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茶叶摇旗呐喊,制造舆论。现选择几个关键点加以评析。

首先,中国近代茶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外国人所述中国近代茶业危机四大产生原因颇有道理,但必须声明,这些原因不是中国近代茶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外国列强的侵略下,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演变为丧失国家独立、主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侵略者正是凭借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通过洋行—茶商—茶农的层层控制,最终将中国茶商、茶农变成了自己的附庸,从而完全控制了中国茶叶外销权,残酷压榨中国茶业,这就是史料所说的“自各口通商后,利之操纵,尽归外洋”,“华商不能与争所致”^①的根源。“华商不能与争所致”的根本原因是外国侵略者建立了以洋行为中心的层层放贷关系。洋行利用茶商资金短缺的弱点,从银行低利贷进款项,转手加价贷给茶商,茶商又加价贷给茶农,这样就建立了洋行为中心的借贷关系,洋行就利用这种借贷关系,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茶商、茶农的经营活动。一般情况下,“华商成本不充,难于周转,不得不急于求售,是以连年亏折”^②。十分沉重的借贷利息负担,造成“种种受制洋人,以致十商九困”^③的恶果。

外国洋行盘剥中国茶商的事实,即使是正直的西方人也有所揭露。1882年,一位彻底了解茶叶贸易情况的外国通信员从中国来信,揭露了英国市场上出售的中国茶叶,怎样在名义价格低于中国售价的情况下还能获利的奥秘。“中国货主把茶叶运至汉口,他们委托广州经纪人出售茶叶,经纪人便把样品送到各家洋行,此时茶叶还在船上。外商洋行争购新茶的竞争总是很剧烈的,交易谈妥以后,广州经纪人便告知他的老板们,这些人对外国人的品格甚至姓名都不清楚。成交以后,茶叶便立即运往购茶人的仓库,进行验收、过秤等等。大概按市价多给了一二两银子的狡猾的购茶人,这时便乘机为难,说茶叶与样品不符,因此必须扣除一两银子。茶贩反对,但无法可施;因为,如果他把茶叶运走,他的茶叶也不会有别人购买。先前急于争购茶叶的外商现在却像工会会员一样坚定,他们对别人不要的茶叶决不过问,这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帮助的一种制度。这位中国商人不得不依从扣价,然后是过秤,通过巧妙的手法,可以取得5%、8%、10%乃至更高的秤扣。汉口海关承认3%的秤耗,其他扣头还不在此内。因此,一个购茶商可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10-15%的扣头。汉口没有代表中国茶贩的行会,茶贩急欲售茶回家,而他所雇用的广州经纪人则更偏向外国人,而不向着他。由于这个制度(这是近年来实行和完备起来的),一个汉口购茶商在去年可以这样说,他运往英国的茶叶,账面上虽然亏损了6%,但仍留下了12%的利得;这是千真万确的。此间尽人皆知,实行这种可耻的制度的人是谁;这些人经营对华贸易的一种新途径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或者几乎是所有主张人格和清白、反对欺诈买卖的洋行,都被排斥于华茶贸易之外。除了这些欺骗行为外,在所有包装和装船费用方面还有很大的回扣,这些回扣都为汉口购茶外商所攫取。在席包、力资等方面的回扣为20%-40%;但是这些回扣可以认为是商会规定的收费标准的合法措施”。这封出自外国通信员的来信“将有助于说明,购茶外商何以能够在每年显然有重大亏损的情况下实际上却很兴旺”^④的真相。在外国洋行的百般盘剥下,中国茶商损失惨重,亏本、倒闭情况比比皆是^⑤。至此,就不难理解,“卖茶的钱究竟落到谁的手里了”这一问题,要说“大部分的利润是被中间商人”囊括去了,这个中间商人当然主要是外国洋行,“真正交到种植者手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54-555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53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53页。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73-974页。

⑤ 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商的经营状况》,《近代中国》第10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里的那一部分,又须由许多人分配,因此每人所得不多”^①。走投无路的茶商转而将负担转嫁给茶农,又尽量剥削茶农以求补偿,导致“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茶山抛荒不能随时照料”^②,茶业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其次,挽救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根本出路。外国人认为,应该让洋商自由出入通商口岸,“甚至出茶之地,彼可自往自办”^③。在他们看来,“可以肯定说,只有在产茶区输入欧洲的资本和经营方法,才能挽救这一国家的茶叶外销免于衰退。如果外国人能够自由进入这一国家,情况就一定会彻底改变”^④。因此,挽救中国近代茶业危机的根本出路,“应当是让外国商人自由地深入内地,并且采用最新的方法,制造供应市场的茶叶”^⑤。恰恰相反,外国商人“自由地深入内地”的结果,不但没有挽救中国近代茶业危机,反而成为摧残中国茶业的真正原因。如中国砖茶领域,由于俄商自1863年深入茶叶贸易中心汉口,并在鄂南建立了自己的砖茶厂,这样“砖茶贸易完全掌握在俄国商人之手”^⑥,砖茶生产也被他们掌握。中国原有的以晋商为首的砖茶生产和贸易遭受灭顶之灾,无力与之竞争,完全处于苟延残喘状态,只有到1917年俄商退出中国茶叶市场,中国商人的砖茶业才有所恢复。可见,俄商独占中国砖茶的生产与贸易,使中国砖茶业遭受灭顶之灾。

中国一般茶叶生产过程中,虽无多少外国企业的控制,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外国商人“自由地深入内地”的结果,却是中国茶业的衰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败退。因为,茶农的困苦,表面上看是茶商残酷剥削的结果,但实际上,在茶叶流通市场上,中国商人又受到外国茶行的残酷盘剥。其实,掌握茶叶出口的外国洋行是最大的剥削者,中国茶叶贸易“大部份的利润是被中间商人”囊括去了的这个“中间商人”^⑦,实为操控中国茶叶市场、决定茶叶售价的洋行。处于最底层的茶农,“除开销摘工之外实已无余,故山户终岁勤劳,不获一饭之饱之情形也”^⑧。茶农成了一切剥削的最终承担者,这样“中国对茶叶生产的任何改革,缺乏有利的条件”^⑨。至此,不难发现,“应当是让外国商人自由地深入内地,并且采用最新的方法,制造供应市场的茶叶”这一主张,只能便利外国侵略者“采用最新的方法”盘剥中国茶农,造成中国茶农的更大贫困,根本不是挽救中国近代茶业危机的良策,反而加速了中国茶业的衰败乃至破产。

第三,挽救中国茶业经济危机的根本启示。至此,所有的考察都让人们明白了一个简单而关键的道理,这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侵略者的“最新的方法”不可能造福于中国人民,这是中国人民历经磨难和长期奋斗得出的正确结论。要挽救中国茶业危机,发展中国茶业,繁荣中国茶产业,必须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赢得完全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让中国人民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这样的新时期,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利用“最新的方法”,实现中国茶业经济的迅速发展^⑩。

(下转第22页)

① 《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册,第300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465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55页。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7页。

⑤ North China Herald, 1887年10月27日, P 446。

⑥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年)》第1辑,第44页。

⑦ 《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册,第300页。

⑧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73页。

⑨ 《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2册,第565页。

⑩ 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6期。